

周佳榮 著

新民 與復興

近代中國思想論

第二版

新民 與復興

周佳榮 著

近代中國思想論
第二版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Asian Studies Series 11

New Citizen and Revival:

Major Themes in Modern Chinese Thought (Second Edition)

by Chow Kai Wing

亞洲學術文庫 11

新民與復興——近代中國思想論（第二版）

著 者 周佳榮

策 劃 李家駒

執行編輯 李名揚（第二版）

出 版 者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全資附屬機構〕

香港筲箕灣耀興道3號東匯廣場8樓

電話：2565 1371

網址：<http://www.hkep.com>

印 刷 者 DG3 Asia Limited

香港柴灣利眾街34號寶源（東丞）工業樓9樓

發 行 者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3字樓

電話：2150 2100

1999 年初版

2008 年第二版

© 1999 2008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ISBN 978-988-200-472-6

版權所有，如未經本公司書面批准，不得以任何方式，在世界任何地區，以中文或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或轉載本書圖版和文字之一部分或全部。

序

本書收錄的十五篇論文，主要是我近十年來發表的著作，內容圍繞着近代中國報刊、思潮與政治的發展，有時也觸及中日關係以至亞洲問題，大抵反映了我在中國近代史方面的研究興趣和路向。

為了突顯主題，我把論文分為三輯。第一輯的五篇，均與近代中國的亞洲聯繫和亞洲認識有關。中國立足於亞洲，在古代與朝鮮、日本、越南形成「東亞文化圈」（漢字文化圈）；近代開始，且與亞洲整體的命運息息相關。〈近代中國思想家的亞洲觀〉闡述十九世紀中葉以後中國與亞洲國家的聯繫，亞洲觀的形成經過，以及重要思想家的理論等，可以視為全書的總綱。在亞洲諸國之中，日本是近代化成功的典型例子，對中國亦有相當影響，〈晚清時期的「日系報刊」〉探討明治日本人在中國的言論活動，〈戊戌維新時期思想家的日本認識〉則申論康有為、梁啟超等的日本觀；梁氏流亡日本多年，〈梁啟超與日本明治思潮〉一文對此有較深入的分析。梁氏曾與越南民族運動家潘佩珠往還，並為他出版《越南亡國史》，致學界誤認此書是梁氏所撰，〈梁啟超

與《越南亡國史》一文即為考證其始末而作。

第二輯的論文，主要探討戊戌維新和啟蒙思潮，以及革命與君憲的論爭等問題。論者每以《時務報》、《清議報》、《新民叢報》代表變法、保皇、立憲三種思想，梁啟超亦因此而成為「輿論界之驕子」。〈從「時務」到「新民」〉探討梁氏早年的言論活動，〈中國國民性的更新〉專論其《新民說》，〈梁啟超與近代中國學術文化的更新〉，進而指出梁氏對二十世紀中國知識界的影響。〈從思想史看《新民叢報》〉一文，強調《新民叢報》在近代中國啟蒙思潮中的重要性；〈《民報》與《新民叢報》論爭的再評價〉，則為此次大論爭提供較全面的分析。

第三輯所述內容，包括清季革命和民國政情。〈章太炎論印度民族獨立運動〉一文，透過章太炎的中印聯合構想探討晚清這位國粹主義革命家的亞洲觀。〈辛亥革命對亞洲的影響〉從亞洲史角度論述辛亥革命的意義，兼及孫中山思想在國外的影響；〈中日關係與印度問題——孫中山論亞洲前景〉接續上文，對孫中山的大亞洲主義有所發揮。蔡元培是清季另一主要的革命領袖，而以教育方面的成就最大，〈從清末中日關係論蔡元培思想的發展〉、〈魯迅與蔡元培〉兩篇，多少說明了蔡氏出入於政治與文化之間的情形。

近代中國思想史、政治史上人物眾多，我對蔡元培研究的感情最深，而對梁啟超研究的興致最大，此外也及於章太炎、孫中山等。他們各有不同的見解，但都對

民族、國家懷着抱負，對整體的人類社會有所寄望，是值得注重和尊敬的。我把他們歸類為「文化意識型的政治家」，在亞洲政壇上，相信只有這一類型的人物，可以真正地為眾多苦難的人們引領前路。

十九、二十世紀之交形成的中國學問，其精髓在一「新」字，「新學」不但指來自歐美的「西學」和來自日本的「東學」，實則還包括更新後的「國學」。梁啟超是二十世紀中國知識界、文化界的啟蒙大師，他的《新民說》甚至被譽為「新時代的聖經」。不過，思想、文化的啟蒙須與教育配合，教育家蔡元培曾發表〈對於新教育之意見〉一文，倡導軍國民教育、實利主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美學教育、世界觀教育五大方針，而特別重視最後一項主張。如所周知，中國是亞洲主要國家之一，要有真正的世界觀，必先具體地、深入地認識亞洲。正如黃仁宇教授在其1998年新著《關係千萬重》的〈自序〉中說：「讀者必須注意二十一世紀中國的前途將部分由周邊國家的出處決定，有如在二十世紀日本與美國的命運半由中國決定。」研究中國必須認識亞洲整個區域的發展，是黃仁宇教授構築其「中國大歷史」的要素之一。

我在三十年前考入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歷史系，自此得窺史學的堂奧。當時新亞書院的創辦人、著名歷史學家錢穆先生已退休離校，但創校時在艱苦中奮進的新亞精神仍然薪火相傳。歷史系教師只有數人，學問規

模卻很宏大，我因研習志趣以中國近代史、日本史為主，受王德昭師、陳荊和師兩位影響較大，牟潤孫師在中國史學史方面也啟發良多，而系主任孫國棟師則特別關懷我在學問上的成長。

遠赴廣島大學深造期間，在橫山英師指導下，完成有關《蘇報》與清末政治思潮的碩士論文，又隨今堀誠二、今永清二、寺地遵諸師修習東南亞華人史、東南亞宗教史、宋代史等。其後又得香港大學中文系趙令揚師指導，完成關於《新民叢報》研究的博士論文。至此對於錢穆先生當年為書院命名「新亞」的用意似有所悟，他替新亞歷史系所奠下的根基，只要向前再走一步，即可從中國到亞洲而達於世界。至其關鍵，則在「復興」二字而已。

香港浸會大學其初是私立大專院校，經歷過很多困難才奠定今日的地位，浸會精神強調在艱苦中求進，實與新亞精神暗合。我擔任歷史系系主任一職，倏忽已逾三載，每以當年諸位師長的教誨為念，不敢怠惰。惟望今後教學、研究與系務能夠同時兼顧，為史學界多盡一分心力。

在繁重的教學工作之餘，要致力於學術研究是十分艱辛的，幸而這些年來，與摯友陳萬雄、林啟彥、李金強諸兄時相往還，於事業方面彼此互勉，在學問的道路上可以結伴相隨。這些論文的完成，實在得力於內子愛恩的關心；浸會大學歷史系秘書陳月媚女士，常為我分

擔不少行政上的事務；文稿的整理工作，全賴侯勵英小姐的協助；本書的出版事宜，復有李家駒兄的支持。特誌於此，以表謝意。

周佳榮

1999年2月22日

目 錄

序	i
---------	---

第一輯 亞洲聯繫的開展

1. 近代中國思想家的亞洲觀	3
2. 晚清時期的「日系報刊」 —— 明治日本人在中國的言論活動	23
3. 戊戌維新時期思想家的日本認識	43
4. 梁啟超與日本明治思潮	60
5. 梁啟超與《越南亡國史》 —— 近代中越關係史上的一段插曲	82

第二輯 維新和啟蒙思潮

6. 從「時務」到「新民」 —— 梁啟超早期的言論和思想	97
7. 中國國民性的更新 —— 梁啟超《新民說》析論	127
8. 梁啟超與近代中國學術文化的更新	151
9. 從思想史看《新民叢報》	168
10. 《民報》與《新民叢報》論爭的再評價	183

第三輯 政治變革與復興

- 11. 章太炎論印度民族獨立運動
—— 清末一個國粹主義革命家的亞洲觀 207
- 12. 辛亥革命對亞洲的影響 228
- 13. 中日關係與印度問題
—— 孫中山論亞洲前景 244
- 14. 從清末中日關係論蔡元培思想的發展 252
- 15. 魯迅與蔡元培
—— 從拒俄運動到中國民權保障同盟 273

附錄

- 附錄 1 「蘇報案」論爭始末述評 301
- 附錄 2 近代中國留學史研究趨向 309
- 附錄 3 梁啟超研究的新開展
—— 從二十一世紀出發 321
- 重印後記 334

第一輯

亞洲聯繫的開展

1. 近代中國思想家的亞洲觀

一、早期史地著作中關於亞洲的記述

中國立足於亞洲，自古以來與其他亞洲國家的政治關係、經濟往來及文化交流都是相當頻密的。但「亞洲」這地區概念並非中國所固有，而是來自西方，其逐漸為中國人所認識，始於十九世紀中葉；中國自覺為亞洲的一員，且與亞洲各國互有連帶關係，甚至領會到彼此同屬於一個「命運共同體」，更是遲至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事。

早在二千年前，即秦漢時期以來，中國就產生了中央集權的國家政治組織，成為亞洲的一個強大國家。在中國周圍的小國，通常都向中國朝貢，表示臣服，而中國則視這些小國為藩屬。這樣就形成了一個「天下統於一尊」的世界國家觀念，並且長期固定下來。⁽¹⁾ 加上以文化程度高低作為衡量準繩的「華夷」思想，中國中心的「天朝」觀念便更鞏固了。西方學者看來，「在這兩千

(1) 參閱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上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47年初版；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重印本，1969年），頁51－52。

年中間，中國是一個獨特的和持續的政治文化實體，同相鄰的各國人民和各種文化相互發生作用。它本身就是一個世界，……這是一個完整的國際體系。」⁽²⁾

五大洲的概念，是在明朝末年由耶穌會教士利瑪竇（Matthaeus Ricci, 1552 — 1610）傳入中國的，亞細亞、歐羅巴、亞墨〔美〕利加等名稱，基本上一直沿用至今。不過，要到艾儒略（Julius Aleni, 1582 — 1649）抵中國後，才有系統的地理著作介紹世界各國，因為他在1623年刊印的《職方外紀》，是中文著作中第一部介紹五大洲地理的專書。⁽³⁾

十八世紀初，清政府禁止天主教傳教活動，中西文化交流中斷，很多西方傳入的知識，不但沒有機會普及於社會，反而逐漸為人所遺忘。清高宗（愛新覺羅·弘曆，1711 — 1799）曾命人繪製中外大地圖，於1761年製成銅版，是極其完善的亞洲大陸全圖，後世稱此為《乾隆內府銅版地圖》。⁽⁴⁾但在這以後的一個多世紀，中國人對於五大洲之類的地理知識，仍然茫無所知，試舉一事為例：近代中國著名報人梁啟超（1873 — 1929），十二歲中秀才，十七歲中舉人，翌年（1890年）赴京參加會試失敗，歸途中在上海購得《瀛環志略》一書，讀

(2) [澳] 費思榮（S.F.Gerald）著，鄭強譯《中國與世界》[*China and the World*]（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頁11。

(3) 參閱沈福偉《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414 — 417。

(4) 同上，頁420。

後「始知有五大洲各國。」⁽⁵⁾以梁啟超這樣出色進取的青年士子尚且如此，更惶論絕大多數沒有學識的民眾了。

徐繼畲（1795－1873）輯著《瀛環志略》十卷，刻印於1848年，雖然比魏源（1794－1857）編撰的《海國圖志》稍遲出版，卻是十九世紀後半期中國人了解外部世界的標準地理讀本，對這一時期知識界觀念的變化有過長久的影響。⁽⁶⁾眾所周知，近代中國第一個致力於認識西方情況的人是林則徐（1785－1850），他在1838年以欽差大臣身分赴粵禁煙，另一方面則派人翻譯外文書報，編成《四洲志》，記述世界五大洲三十多個國家的地理和歷史，是近代中國第一部較有系統的世界地理志。其後魏源應林則徐的要求，在這個基礎上編成著名的《海國圖志》。此書在1842年完成時有五十卷，1847年增補為六十卷，1852年再增至一百卷，而百卷本所用的參考材料，已經包括《瀛環志略》在內。⁽⁷⁾

《海國圖志》中的〈阿細亞洲總說〉，主要內容不外是引述明末艾儒略《職方外紀》，謂「亞細亞者，天下一大州〔洲〕也，人類肇生之地，聖賢首出之鄉。……所容國土不啻百餘，其大者首推中國。」又引《萬國地理全圖集》曰：「四大地之中，亞齊亞最廣大。……亞齊

(5) 梁啟超〈三十自述〉，見林志鈞編《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上海：中華書局，1936年），頁16。

(6) 參閱潘振平〈《瀛環志略》研究〉，《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4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頁65。

(7) 參閱李漢武《魏源傳》（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1988年），頁100－101。

亞，西方為各人類始祖之本地，道理術法與教門一皆由亞齊亞出，故互古至今，視為重地。」引文下註有小字：「案亞齊亞即亞細亞也，一作阿悉亞。」在〈釋五大洲〉中又有案語，謂阿細亞洲「一作亞細亞，一作阿西阿。」⁽⁸⁾可見亞洲在這時還未有定稱，同一書中竟出現阿西亞、阿西阿、阿悉亞、阿細亞、亞細亞、亞齊亞多種譯法。

在徐繼畲的《瀛環志略》中，則統一使用「亞細亞」一名，並清楚指出：「亞細亞，本土耳其買諾古時地名（原註：土耳其西土國名，有東中西三土，其中土名買諾，今稱小亞細亞）。泰西人於此土之東，統名曰亞細亞。」⁽⁹⁾但此書初出時受到一些士大夫的批評，認為對西方列強的敘述過於誇大，所以流傳和影響相當有限；要到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洋務運動開展，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亦印行此書後，才受到中國知識界的重視。《海國圖志》一書的遭遇，也大致相同。值得注意的是，上述這兩種在鴉片戰爭結束後不久由中國人自己編寫的介紹世界史地的巨著，雖然初時都為本國人所忽略，在鄰邦日本卻備受推崇。近代日本比中國較早出現模鑄亞洲觀的過程，恐怕與此有關。

(8) 〈阿細亞洲總說〉在六十卷本《海國圖志》（揚州：古微堂鐫板；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本）中見於卷3，而在百卷本（邵陽急當務齋1880年刊本）中則置於卷5；〈釋五大洲〉在六十卷本中見於卷46，在百卷本中則見於卷74。

(9) 徐繼畲輯著《瀛環志略》（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本，1986年），卷1，頁17。

二、日人言論對中國的影響

近代日本人對亞洲的觀感，當以福澤諭吉（1834－1901）的「脫亞」觀點為典型。他在1885年發表的〈脫亞論〉一文中，認為日本國土雖在亞洲的東邊，其國民精神已經脫離了亞洲的固陋，而移於西洋的文明，應該謝絕與「惡友」中國、朝鮮往來。不過，在另一方面，日本人仍然強烈地保留着與中國唇齒相依的傳統觀念，甚至由於長久以來對中國的尊崇，產生了中日提攜以對抗歐美列強的想法。⁽¹⁰⁾ 樽井藤吉（1850－1922）的《大東合邦論》，不但在日本起過作用，而且也影響了十九、二十世紀之交中國人對亞洲問題的看法。

《大東合邦論》原用日文於1885年寫成，但樽井藤吉旋因政黨問題牽連入獄，稿件散失，後來改用以漢文撰寫，在1893年出版。作者自稱使用漢文的理由，是為了方便韓國人及中國人閱讀。書中倡議日、韓兩國徹底的對等合邦，成為「大東國」，進而與中國聯盟，以對抗俄國南下之勢。⁽¹¹⁾ 上海大同譯書局翻刻此書，題為《大東合邦新義》，內文是用原本復刻，但挖改數處。1898年戊戌維新進行得如火如荼之際，在思想上傾向變法的翰林院編修、後來成為著名教育家的蔡元培（1868－1940），便曾閱覽此書，並用原本互校，檢出書中控

(10) 參閱周佳榮《近代日本文化與思想》（香港：商務印書館，1985年；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4年），頁29、75。

(11) 同上，頁76。